

纪念列宁诞辰 150 周年专稿 (二)

引文格式: 史炳军. 列宁文化安全思想研究 [J]. 常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1 (4): 1-11.

列宁文化安全思想研究

史炳军

摘要: 文化安全是列宁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列宁指出, 党的领导是文化安全的前提,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把文化的领导权牢牢控制在布尔什维克党手中。文化革命是文化安全的核心, 其根本目标是提高人的文化素质, 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保障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文化批判是俄国文化安全的重要实现路径。他不仅抨击了俄国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文化思潮, 同时也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代表进行了深刻批判。列宁的文化安全思想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文化安全问题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关键词: 列宁; 文化安全; 文化革命; 文化批判

作者简介: 史炳军, 历史学博士, 江苏警官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任务项目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新时代高校文化安全教育研究” (18JDSZ1013)。

中图分类号: A82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0.04.001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资本主义社会迈入帝国主义阶段。尽管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 但当时的俄国还处在沙皇专制统治下。虽然 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但俄国总体上还是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在俄国广袤的农村地区, 普遍存在的是前资本主义的、宗法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明显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 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此起彼伏。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 结合俄国经济社会的特点,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论断。他带领俄国人民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文化上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的洗礼, 沙皇统治时期积累的官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奥勃洛摩夫精神”根深蒂固, 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甚嚣尘上, 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从政治上的“征服者”沦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的巨大风险, 文化安全问题成为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

列宁非常重视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其思想体现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怎么办》《新

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青年团的任务》《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等文献里。他认为无产阶级执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应该把文化建设作为国家工作的重心之一。列宁的最后五篇论文,第一篇就是关于文化教育的《日记摘录》。列宁指出,文化建设既是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民主政治建设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文化水平的提高,所有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的设想都是空中楼阁。列宁强调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要控制文化的领导权,把它牢牢掌握在布尔什维克党手中。

(一)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列宁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开始,就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特别强调革命理论对党的建设的指导意义。他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或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方法。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1]274}。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可行的理论体系,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只要“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上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上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2]。他以高度的理论自信提出:“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指导,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1]273}列宁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教条,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绝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274-275}只有与各国国情相结合,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

(二) 掌控文化建设领导权

从政治学的视角看,领导权的实施无非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强制的方式,它以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为后盾;另一种是通过教化的方式,靠的是被统治者内心的认可。前一方面是硬的一手,后一方面软的一手。一般而言,统治阶级会软硬兼施,以此作为其阶级统治的工具。相对而言,后者的实效性更强,更有利于政权的稳定。列宁讲的文化领导权,就是通过对人民群众的教育达到对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认同。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不仅肩负着军事革命政治革命的任务,同时肩负着文化革命的使命,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1]328}。列宁非常重视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把它看成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内容,强调党必须牢牢掌握文化工作的领导权。为此,列宁非常强调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严格党员的入党条件、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加强对党员的纪律监督、共产党员犯罪要受到比普通人更重的惩罚。从1919年10月到1921年9月,俄共(布)进行了两次清理党员队伍的活动。这些举措保证了党员队伍的纯洁性,提升了党的战斗力,为强化党的文化领导权奠定了基础。

（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指出，“专制就是领导”^[3]，“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和整个社会）的领导”^[4]，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方式。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提出了苏维埃是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组织形式。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他提出无产阶级应该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国家与革命》中，他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十月革命后，列宁分析了俄国过渡时期经济结构的特点：一是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二是小商品生产者（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三是私人资本主义；四是国家资本主义；五是社会主义。他因此确定了俄国过渡时期的主要阶级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进而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在他看来，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社会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个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5]。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根本任务是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只在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6]。即是说，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无疑要以暴力为中心；但在和平建设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则是以国家机器为后盾，通过经济、教育、行政、法律等途径来实现。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行政的和教育的，都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一书中，他认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都必须服务于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二

列宁充分认识到文化建设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和发展俄国经济以及推进苏俄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在他的最后几篇论文中，他提出要在文化领域推行一场革命。在他看来，“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7]⁷⁷⁴。他是在文化建设的意义上使用文化革命一词的。他从苏俄实际出发，认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提高人的文化素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帝国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压力和挑战：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对苏俄进行军事封锁和武装干涉；国内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各种机会主义思想流派异常活跃，有的直接成为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帮凶；一些群众和布尔什维克党员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经过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没有明显的先进性和制度优越性，进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产生动摇。列宁认为，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布尔什维克党员应该有忠诚意识。他把社会主义建设比喻为攀登高山，这是“世界上还不曾有人到过的高处”，前进的征途中无疑会遇到很多艰险，也不知何时能到达终点，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清醒的头脑，就会陷入误区、半途而废，甚至背弃共产主义。不难看出，列宁已经把理想信念教育的成败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兴亡的高度。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7]307}在他看来,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服务大局、服务党的中心工作。革命时期的中心工作就是夺取政权,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向广大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肃清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揭示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帮助广大群众从资产阶级的压迫下解脱出来,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唤醒群众的革命热情,适时开展革命斗争,推翻专制政府统治,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革命胜利后,工作重心转变为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思想政治工作要及时转变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调动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提高他们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

培育共产主义一代新人,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障。无论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都离不开一批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就提出要对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并把这看成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保证。在《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列宁就文化教育工作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作用、内容和任务做了全面阐述。他指出,提高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意识,是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任务。共青团和所有想走向共产主义的青年都应该学习共产主义,而学习过程中必须注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反对只从书本上领会共产主义。列宁希望广大青年不要脱离火热的生活,要注重到实践中去学习。列宁对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工人自发组织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列宁提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应该首先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的楷模,做“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即无报酬劳动的榜样”。

(二) 大力发展国民教育

教育是精神生产的重要领域,教育的发展对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加快苏俄社会主义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工作,都取决于教育的发展水平。列宁充分认识到发展教育对于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重要性。在列宁看来,学校不仅负有向广大劳动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理论教育的职责,而且还担负着批判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任务,苏维埃政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使被剥削的劳动者能够真正享受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8]。针对资产阶级宣传的教育“不问政治”“不讲政治”的观点,列宁给予了深刻的揭露,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伪善”的说法,是对“99%受教会势力和私有制等等压迫的群众的欺骗”^{[7]302}。俄国原有的教育制度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制度,是宣传他们意识形态的工具。必须彻底改变原有教育体制的阶级属性。1917年12月,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将所有的教会学校、特种学校划归教育人民委员会管辖;次年初又通过法令将学校与教会分离,旧的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得到彻底改造。1918年6月,颁布了《关于将所有部门的学校和教育机构转归教育人民委员会管辖》法令,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社会主义国民教育体系建立了起来,有力地维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保障了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安全。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就需要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而苏俄政权面对的是沙皇政权留下的落后的国民教育和大量文盲。在《日记摘要》里列宁谈到,1897年平均每一千个男子中只有318人能够识字,到了1920年也只有409人,妇女及农村地区的识字率更低。大量文盲的存在降低了劳动者队伍素质,

阻碍了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列宁对此高度重视，他甚至把普遍识字作为评判一个民族是否跨入现代社会门槛的标志，他心急如焚地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如何开展群众性扫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成为苏维埃政权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1920年7月19日成立了全俄扫除文盲委员会，1923年又成立了扫除文盲的志愿组织，到1925年，扫盲运动取得显著效果，9岁以上居民的识字率从1920年的31.9%上升到51.1%。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专门人才，这样的人才是现代化的教育培养的。因此，当1920年苏俄政府提出电气化建设计划时，列宁即提出要想经济建设获得成功，必须提升文化教育质量。在列宁领导下，苏维埃政府坚持先进性与民族性统一的原则，积极构建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有力推动了苏俄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占领报刊舆论宣传阵地

列宁非常重视报刊宣传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件“极其重要、极其有益的大事”。列宁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适应不同时期社会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及时调整报刊的主题和宣传方式。十月革命前，革命是无产阶级的主题和时代的主旋律，报刊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无产阶级投身革命运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党报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的旗帜。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国家政权，党的工作重心转为国家管理和经济建设，报刊应成为宣传经济建设的工具。他曾对党报作用做过一个形象的概括，称其为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1900年12月24日，列宁创办了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秘密报纸《火星报》，把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团结在其周围。列宁把报刊看作斗争的武器，他说，没有革命的报纸，就无法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就不可能广泛地组织工人运动。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失去对《火星报》的领导权感到无比痛心，认为这等于失去了俄国无产阶级战斗的中心。在1904年8月写的《告全党书》中，他强烈建议第三次代表大会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交给布尔什维克负责，为此，他在1905年1月又创立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前进报》。1917年10月28日，列宁签署了《人民委员会关于禁止资产阶级报纸出版》的法令，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存在的土壤。1918年3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中》提出，报刊应该利用公开报道的方法进行经济竞赛，帮助群众研究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经济问题。在1921年5月起草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的苏维埃机关的指令”中，专门提及“报刊为经济工作服务的问题”。1923年9月，在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中，列宁为该报规定的任务是：第一，要提供有关苏俄经济的经常而真实的材料；第二，要分析这些材料，整理这些材料，就管理工业等得出正确的结论；还要督促经济战线上的全体工作人员，收集准确的报告材料，表扬有成绩的工作，披露企业、机关或经济部门等单位的疏忽大意以及落后无能的工作人员。列宁一方面把报刊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另一方面把报刊作为服务中心工作的工具，为苏俄社会主义报刊发展指明了方向。

列宁认为党的一切报刊必须无条件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在1905年撰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他认为党报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没有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党的真正统一是不可能的。”^[9]“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10]对资产阶级宣扬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列宁始终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这

些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行为,在剥削阶级主导的社会里,是不存在真正自由的。1919年俄共(布)八大《关于党和苏维埃报刊》的专门决议里,对加强党对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建立无产阶级的宣传体制做了详细规定,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组织保障。

(四) 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一生中撰写了多部哲学经典著作。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在《辩证法的要素》一文中,他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在《谈谈辩证法》一文中,他指出“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利用资本主义文化遗产发展社会主义是列宁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典范。

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是列宁文化革命的重要内容。无论文化的发展还是文明的进步,都是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后人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赋予文明新的时代内涵,这样才会不断造就时代的辉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只有在继承性、开放性的基础上,才会有创新性,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利用资本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只有吸收人类历史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才能真正建成无产阶级文化。

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具体体现为:第一,利用资本主义的技术。列宁认为,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厂、大工业,仅仅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社会主义是无法建立的。他把发展工业与电气化联系起来,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为此,一方面,从1918年开始,他就制定了为期10~15年的全国电气化计划,称之为“第二个党纲”;另一方面,利用当时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机遇,大力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制造业,为国民经济恢复打下了良好基础,使得苏俄从一个农业国迅速发展为工业国,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已成为世界工业强国。第二,借鉴资本主义管理。他用了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长期的社会化大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这些财富是人类共同文明成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有用的,而且可以使社会主义建设少走弯路。正如列宁所言,“我们并不臆造什么工作组织形式,而是从资本主义那里把银行、辛迪加、最好的工厂、实验室、科学院等这些现成的组织形式拿过来,我们只能借鉴先进国家最好的经验”^[1]。新经济政策就是利用资本主义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成功实践。第三,发挥资产阶级专家的作用。要吸收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离不开发挥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作用。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资本主义文化因素,而“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因素”。旧社会过来的专家思想上虽然还残存着剥削阶级印记,但他们本身不是剥削阶级,他们和无产阶级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他们的立场观点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只要给他们合理的政策,就可以把他们团结到党的周围,发挥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基于此,列宁提出政治上要团结他们信任他们;工作上要使用和支持他们;生活上要关心爱护他们,给他们提供较好的待遇和生活条件。同时要注重对他们的思想改造,用共产主义思想提升他们的思想觉悟。他把那些出身资产阶级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当成宝贝,认为他们比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有用10倍。

三

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文化批判依然是列宁文化安全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路径，这是由时代的特点决定的。他不仅要正面抨击俄国革命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和思想流派，同时也担负着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代表的使命。

（一）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本全球化和世界范围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俄国出现了一股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俄国民粹主义，它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为标志。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赫尔岑认为俄国农村的集体村社具备“社会主义”的传统，村社农民朴实无华、相处融洽的品格更具备“共产主义”的精神内涵。其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一思想做了发挥，认为俄国可以以现存的村社制度为基础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民粹主义站在农民小生产者的立场，认为俄国既不能走沙皇专制制度的路，也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路，应该在村社制度的基础上直接实现共产主义。70年代后，民粹主义发生分化，一部分主张与现实妥协，走向自由主义；一部分在工人运动中寻找新的革命力量，转向马克思主义。19世纪中后期以来，民粹主义一直致力于用村社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一大障碍。民粹派在当时知识分子和部分工人群众中有较大影响，成为当时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主要障碍。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指出：社会民主党主张的是工人社会主义，民粹派主张的是农民社会主义。其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中，他认为工人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我们知道，革命的核心问题是领导权问题，也就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民粹派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寄托在农民阶级身上，而在列宁看来，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同时应该团结联合农民阶级。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作为工人阶级代表，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而民粹派是俄国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前工业社会和不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民粹派作为俄国的一种特殊历史文化现象，在村社制还未分化之时，它有其存在的经济历史依据；一旦资本主义在俄国有了一定发展，村社制开始瓦解，它的革命性就消失了，由反对沙皇专制走向拥抱沙皇专制，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民粹派所以如此，与其信奉的世界观有密切关联。民粹派信奉的是主观社会学，它的基本观点是主张以人性作为考察人类社会现象的基础，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这是一种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历史观。列宁指出，民粹派从人性出发考察俄国的历史，从主观的概念出发，竭力美化农民村社，这种虚构出来的村社共产主义只能是一种乌托邦。而社会民主党人从物质的生产关系出发，从社会经济形态出发考察俄国历史，揭示了俄国社会中存在的农民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把俄国社会形态的演化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从而向人们展示出了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前进方向。

（二）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

十月革命前夕，出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布尔什维克党于1917年9月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简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目的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提高他们的理论素养，增强他们战胜敌人的本领。十月革命胜利后，广大群众学习文化的热情高涨，他们纷纷加入协

会,协会人数迅速达到40多万。协会拥有自己的15种杂志,如《无产阶级文化》《未来》《熔炉》等;有自己所属的活动场所,如“中央舞台”“第一工人剧院”“戏剧工作室”“造型艺术工作室”及各种俱乐部;1920年8月还成立了国际局,在英、德、捷等欧洲国家也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对推动无产阶级文化艺术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协会把用知识武装工人阶级作为目标,强调协会的独立性,在当时离开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国民教育部而独立,具有历史进步性。而1918年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派”领导人亚·波格丹诺夫夺取了协会的领导权。他公开拒绝苏维埃政府和教育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宣称文化自治,主张脱离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和监督,把协会放在与布尔什维克党分庭抗礼的位置,提出党管政治领域,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管文化领域。在文化遗产问题上,亚·波格丹诺夫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资产阶级文化全盘否定,鼓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通过“实验室式”方法生产出纯洁的无产阶级文化。在文化创造主体问题上,他主张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只能靠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和文化创造的主要力量知识分子排除在外。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也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构成挑战。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观点予以坚决抨击和无情揭露,指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7]299}。列宁认为,党的领导是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先决条件,他在1920年10月28日起草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决议草案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12]1920年12月1日《真理报》刊登了列宁参与起草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强调必须加强党对文化艺术事业的领导,必须同敌视无产阶级的思潮做斗争。在如何创造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无产阶级文化派天真地认为,无产阶级新文化孕育在产业无产阶级队伍之中,只有彻底根除资产阶级世界的遗产,才能战胜危害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才能建立自己更为完整严谨的新文化。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对人类文化采取的全盘否定做法,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给予了深刻批判,他说:“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7]285}列宁重视对文化遗产的继承,同时也强调对文化遗产的改造,这种批判与继承相统一的文化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三) 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后的第二个五十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别。在国际上以第二国际领导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为代表,在俄国以孟什维克苏汉诺夫为代表。他们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只言片语削弱马克思主义,打着时代和条件变了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遍性,而第一个以完整形式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是伯恩斯坦。他在1899年写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提和任务》一书,被称作修正主义的开山之作。受英国费边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的影响,他以社会主义问题为中心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攻击。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政治上放弃阶级

斗争，放弃暴力革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阶级妥协，劳资合作，和平发展，全盘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但是，经济上还保留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改革目标。他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伯恩斯坦自称是自由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化。”^[13]伯恩斯坦坦言，修正主义，“翻译成政治用语就成为改良主义”^[14]。在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攻击，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

列宁对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公开批判，并揭露了其产生的阶级基础。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公开宣称回到康德去，主张用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代替唯物主义，用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代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创造一种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哲学体系。列宁对其修正主义哲学予以了坚决回击，指出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斗争，反映的是阶级斗争，这个斗争是不能调和的。政治经济学方面，修正主义极力为资本主义辩护。他们说集中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基本不存在了；卡特尔和托拉斯能使资本主义消除危机；由于阶级矛盾正在缓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列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出发，认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克服的，危机的时代并未结束，繁荣之后是新的危机，随着危机的加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修正主义用阶级调和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列宁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出发，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修正主义把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维护一切阶级利益的机关，其实质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主张阶级调和，放弃政治斗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列宁在总结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基础上，撰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揭示了资本主义新阶段——帝国主义的本质、规律，认为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阶段——列宁主义，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列宁始终把文化安全作为一个重要课题。他终生都在思考无产阶级文化建设问题，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一）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文化具有很强的阶级性，是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强调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7]307}。他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各项工作，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编写《论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案过程中，列宁坚持把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写入其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苏俄文化建设，把所有文化机构都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1925年俄共（布）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明确指出，党“应当保持、巩固、日益扩大自己的领导权”。当前，我国的文化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文化思潮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构成巨大冲击,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时刻威胁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始终保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二) 注重制定科学的民族文化政策

苏俄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处理好民族问题对于维护苏俄新政权的稳定至关重要。列宁把民族文化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在指导民族独立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维护民族团结的政策措施。他坚决反对文化上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他主张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维护各民族的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认为各民族在文化上享有完全平等和自决的权利;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文化交流;他充分肯定民族文化融合的发展趋势,认为随着民族间经济社会交往的增多、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在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一种“共同的文化”,并对此充满信心。列宁的民族文化政策对于我国处理好民族关系、维护好民族团结与民族文化安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三) 遵循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它一经产生就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无视或违背文化发展的规律,只能造成文化建设中的欲速则不达。列宁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发展要循序渐进、不可急功近利。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他谆谆告诫全党:“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7]784}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的完成那样迅速,决不可用军事式的激进手段解决文化问题。沙俄遗留下的落后的生产力和阶级基础、大量文盲半文盲,都决定了俄国文化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短期见效,而是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经过长期的过程才能见效。列宁同时反对文化生产领域的“强求一律”和“公式主义”,认为遵循文化生产的规律,就必须尊重文化生产者的个性,因为精神生产是一种个体性的创造性活动,带有极强的个体体验和主观感受,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不可能要求简单划一。文化发展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渐进的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短期见效。我国的现代文化建设,必须全面规划,从长计议,切不可目光短浅、急功近利。

(四) 发挥好知识分子的创造作用

知识分子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要掌握文化的领导权,离不开发挥好知识分子的作用。十月革命后,面对新政权建设的迫切需要,列宁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吸引知识分子投身到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他要求团结利用好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作中要信任他们,给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对一些著名的专家给予高薪。鉴于苏俄落后的教育现状,列宁高度重视教师的作用,他要求提高他们的地位,发挥好他们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广大群众。我国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广大的知识分子,能否发挥好知识分子的作用,关系科技强国战略的成败,关系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败。为此必须团结和尊重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激发其创造性,使他们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

(五) 文化批判与文化继承相结合

任何民族在文化建设过程中都会遇到民族文化遗产问题,而民族文化又与民族认同密切相关,优秀的民族文化是以往民族精华的积淀,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列宁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是在广泛吸收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本国的、外国的、本民族的、

外民族的等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他一方面坚决摒弃旧文化中的沙文主义、官僚主义和“奥勃洛摩夫精神”，同时他对俄罗斯民族文化表示高度认同，称“我们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化虚无主义态度给予了坚决批判。这同样体现在他对国外文化的态度上，他主张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的科技、人才和管理经验，来服务于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新经济政策就是最好的实践范例。列宁对待民族文化和国外文化的科学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对现阶段我国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列宁选集：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列宁选集：第2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3-104.
- [3] 列宁全集：第38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2.
- [4] 列宁全集：第37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36.
- [5] 列宁全集：第3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3.
- [6] 列宁全集：第36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75.
- [7] 列宁选集：第4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5.
- [9] 列宁全集：第1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56.
- [10] 列宁全集：第12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4.
- [11] 列宁选集：第3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2.
- [12] 郑异凡. 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
- [13] 张世鹏. 如何评价伯恩斯坦修正主义 [J]. 红旗文稿，2010（18）：17-21.
- [14] 殷叙彝. 伯恩斯坦文选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40.

A Study of Lenin's Thoughts on Cultural Security

Shi Bingjun

Abstract: Cultural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times faced by Lenin. In his view, the party's leadership is the premise of cultural security. With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the leadership of culture should be firmly held in the hands of the Bolshevik party. Cultural revolution is the core of cultural security. Its fundamental goal is to improve people's cultural quality, create a new generation of communism and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Cultural criticism is a significant path to realize cultural security. It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various cultural thoughts in the process of Russian Revolution, but also deeply criticizes revision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and its representatives in Russia. Lenin's thoughts on cultural security have left rich spiritual heritages for socialist countries to deal with cultural security issues.

Keywords: Lenin; cultural security;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al criticism

（收稿日期：2020-05-25；责任编辑：晏小敏）